

符號學與空間理論的遇合：蔡秀枝教授訪談

蔡秀枝 彭佳

蔡秀枝，“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外國語文系暨研究所博士，現任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符號學、敘事學、文學理論、都市研究，尤其對符號學與空間研究有相當程度的深耕。發表學術論文八十餘篇，其中不少被臺灣核心期刊（TSSCI）收錄。

彭佳（以下簡稱彭）：蔡秀枝教授您好！謝謝您接受我的訪問。我在閱讀您論著的過程中發現，您的符號學研究首先是集中在對一些西方符號學家，如裏法台爾（Michael Riffaterre）、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的理論研究上，然後漸漸轉向對“符號空間”這一主題的探討，尤其是對文本空間和社會文化空間做了對照性的討論和批評。能否請您談談這種研究上的轉向是由什麼驅動的？是否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學界始於上個世界下半葉的“空間轉向”的影響？

蔡秀枝（以下簡稱蔡）：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要回到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的研究上去。我的論文最早是研究時間的關係，接下來才探討空間的關係。我主要是做文學研究，尤其是英美的文學研究，從小說的觀點出發，它本身就是一個時間和空間交錯中的人物的展現場景。我早期在討論人物的存在與時間概念的時候，就從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開始處理人的存在與空間之間的關係；然後慢慢經由現象學與詮釋學的方式來看待人處在空間中的位置、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而推進到讀者如何處理文本裏面所敘述的故事、它的場景、小說人物的分析，以及整個文學、文化、社會空間對文本敘事的影響力。我早期的研究是集中在讀者對作品的解讀上，也就是所謂的讀者的詮釋批評。之後在研究中比較有突破性的地方，就是討論海德格爾所說的一個“居住”、或者說“安住”的空間是如何影響人的存在，這就切入了我的博士研究中的議題，即空間的關係如何在文本中被展示出來。在那個時期我就開始從詮釋學、存在主義和其他一些文學理論的角度去看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特別是俄國的形式主義如何從語言文字的角度去進行文學的研究，包括幾位比較特別的理論家，比如葉爾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和雅各森（Roman Jakobson）。然後我讀到了羅蘭·巴爾特和艾柯（Umberto Eco）等人的符號學理論著作，由此藉由結構主義的方式去查看結構的問題。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我非常開心地發現西方理論家，比如說我們下面要談到的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對符號學提出質疑，認為符號學研究不談歷史與實踐。在我運用他的空間理論研究文學文本裏的社會空間，並建立我自己的空間符號學理論論述的過程中，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但作為一個符號學者和後結構主義者，其實我對他的論點是有所質疑的，因此我也要在此點上尋求超越。如何去切入文學文本，去看裏面的空間場域和歷史、文化的交互影響，就會變成一個超越了純粹哲學和日常生活批評的討論。馬克思主義者日常生活批評的角度是社會性的，而我所觀察的物件是小說、散文、詩歌，是文學文本；因此它可以借著這樣一個大的時間跨度和寬闊的空間向度，加上不同文化對於人的存在的思考面向，去探求各國文化特殊的思維和在地想像。這就回到了這樣一個問題：符號學家如何以符號結構的方式去看世界？在全球化的時空交錯中，我們如何從符號學的角度去讀入已經存在的文學文本世界、或者是別的國家和民族所呈現出的歷史和文化的觀點？因此，可以說我的研究路線是時間和空間研究的慢慢融合，經由詮釋學到結構主義、再到後結構主義，藉著哲學家、語言學家、歷史學家和符號學家所提供的不同角度，去研究文本中時空交錯的關係和架構。我個人覺得最得力的地方在於，我的研究物件是文學文本，它與符號學呈現出的結構關係會呈現出一種相異文本間的跨越，也可以作為一個仲介的工具，幫助研究者去展現這個世界和不

同的世界觀。同時，作為一個理論家，我必須要保持和文本之間的距離關係。這種仲介式的角色正好回到了索緒爾的符號二元組合：觀念(*concept*)和語音模組(*sound pattern*)的關係，或者，葉爾姆斯列夫所說的，內容(*content*)和表達(*expression*)之間的關係：空間裏的觀念其實得力於你所觀看的表達。而一個文學研究者所面對的是一個文字所構築的世界，他應該將文本中的空間再度地抓取、或者說呈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我的角色不僅僅是一個討論者，也是一個讀者、一個仲介者；在每一個層面的跳躍和對它的再現過程中，符號學的理论都是很有力的工具，因為我們總是藉著語言去顯示世界。不管是文化空間的世界還是文本的世界，都是經由語言重寫出來的。這樣的一個角度和角色，也是我作為一個符號學者、一個文學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覺得最有趣和愉快的地方。

彭：您剛才說到，您的研究是從對時間的考察開始的。不少學者在研究文本中的時間關係時，雖然用了空間化的方式來進行描述，但他們的研究所體現出來的“空間化”實際上是一種比喻的、類似圖表的關係表述。而在您的研究中，您將文本空間和個人在空間中的位置視為一種生產性的、實際的空間關係。您在《混雜與過渡》、《看不見的城市》的空間想像》中也援引了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來進行討論。您也提到，對他的這一理論，您是存有質疑的。那麼，您的質疑、或者說對空間生產理論的看法是什麼呢？

蔡：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一書中，對空間做了三個層面的區分。第一個部分是純粹的空間演練(*spatial practice*)，即現實生活的空間或者小說文本的幻想空間中人物和場景的一個表現或者說呈現。這是第一層次的空間。第二個部分是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它的英文翻譯和法文原文其實有一點區別。它的意思是人在經由空間演練的過程之中經歷到的空間中所覆蓋的或者本身具有的一些結構關係，比如說限制、法規或者說限制性的城市規劃等等。第三個部分是所謂“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也就是說，我意識到了我所在的空間的歷史沉澱，包括它的歷史痕跡和傳統(這是第一層次的空間)和法規、具體規劃(這是第二層次的空間)的存在，經由我作為“人”的行動力和在空間中的活動，去將前面兩層空間展演出來。這就是列斐伏爾所認為的三個不同層次的空間之間的關係。並且他認為：符號學者對空間的研究過於形式化，不能解決空間關係的問題。而我在研究中希望能夠逐漸達成的一個目標，恰好是運用符號學的理论去修正列斐伏爾空間觀念中的缺失。在《混雜與過渡》一文中，我曾經提到，席爾德(*Rob Shields*)就對他的空間理論有過批評，因為他並沒有清楚地區分出這三個空間區隔的辯證關係。席爾德認為，這三層空間的概念在實際的空間演練時，很難做出真正的辯證和區分，因為它們之間的關係其實是混淆的。比方說歷史的關係、空間的規範和人的展演，這三層關係雖然存在，但它們是如何被切分出來、以及如何證明空間有再生產可能的這一觀點，列斐伏爾並沒有清楚的說明。如果說空間需要不斷地進行再生產以支撐之前的生產條件，那麼這三層的空間還是不足以構成辯證關係上的整體性。席爾德並沒有回答這一問題，但我認為，如果我們有可能為列斐伏爾做一個後續的建構的話，它是可以經由符號學的層級關係、尤其是後結構主義者建構出來的符號學關係，重新把這三層關係做一個更加緊密的聯結。我的個人看法是，列斐伏爾所說的第一層空間，也就是歷史空間其實是靜止的；它如果不能與個人的生活有交集或者切入的話，是不具備動力的。活動的主體是人，當有思維的人漠視了空間的演練裏傳統或者累積的城市經驗時，這一層空間基本上是被忽略的。但符號學者要建構的世界不僅僅是要去展現這三個空間的分離，還要去促成這三層空間之間的辯證關係或者說互相變動的可能。從小說的角度來說，人物如何生活在有歷史傳統和法規的狀態下，從他的日常生活當中保持認知上的反省，那麼才有可能返回到第一層空間中去解釋文明和傳統的傳承，並且看見當下的空間中與個人直接相關的法規和限制，對它們進行抵制、衝撞，或者說挪用，也就是賽朵(*Michel de Certeau*)所說的用“策略性的運用”去突破日常生活中的限制，去轉換位置和角度，重新思考歷史背

景和規範本身的真偽，以及它後面所隱藏的意識形態關係或資本關係。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從第三個層面向第一和第二層空間，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質疑、挑戰，並且進行空間上的並置。只有經過行動上的對前兩個空間的抵制和挪用，你才有可能意識到這個空間的空間性對你和你周遭環境的鉗制力量或者說引導力量。在這裏要特別提出來的是，我認為不管是去研究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或者是空間中現實存在的生活個體，都有一個因素是不可忽略的：必須要針對空間裏的各種權力的架構和角力關係，並且探討這個權力場域後面的知識建構體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在實在的空間操演，也就是策略性的運用之後，真正對其他兩個場域產生影響和作用；否則就只是機械地遵循前兩層空間為個人規劃的路徑而已。而對三層空間關係的靜態分析模式，並非後結構主義符號學家的努力方向：即利用語言之外的其他方式去探求各種架構關係中的鬆動可能。

彭：也就是說，個人對歷史和法規的空間的抵抗和反省只能是在空間之歷史沉積的某一共時截面上的，這個截面也就是我們反思前兩層空間的著力點所在。很有意思的是，對“符號空間”的批評，在其他理論批評家的論著中也可以看到；但各位學者對此的看法不盡相同。約翰·菲斯克（John Fiske）就在他著名的《民族符號學：個人和理論的反思》一文中指出，女性觀眾可以用自我愉悅的方式去抵抗父權話語的宏觀意識形態，雖然這種抵抗是不完全的、逃逸性的；但她可以在社會的宏觀架構之中創造出自我的、獨立的符號空間。和您的觀點不同的是，向來對大眾的力量頗具信心和樂觀精神的菲斯克並不認為認知上的反省和批判意識是必須的，而是相信大眾可以用自我的愉悅去抵抗宏觀意識形態的空間性。而相同之處在於，他和您一樣強調了對空間中慣常存在的符號、規則、文本做出不同解讀的可能性。儘管文化主宰者的操演是隱匿地存在於生產的系統當中，但由於符號的詮釋本身擁有著無限的可能，我們對空間的解釋和反省也就有了多種可能。

蔡：語言所具有的語義和意指、以及由語言構成的文本的意義，本身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演變的。語言作為一種表達工具，就如索緒爾所說的，並不是要去呈現現實，而是一種指涉關係；而指涉關係就不會是一對一的對應。既然語言和現實不是一對一的對應關係，那麼盡力去逼近現實的各種語義單位，就會和現實之間出現分裂狀態；因此，對語言本身也不可能有一個最終的、絕對的解釋。後結構主義者——如巴爾特和克利斯蒂娃——就認為對文本的解釋過程就是符號的意義生產過程，它不會是最終的意義確立，而是在社會文化脈絡中產生的一種解釋的可能性。所以，當我們以語言符號來理解和呈現現實的時候，它和現實會在某種程度上有必然的決裂；而這個衍義的過程也是後結構主義的符號學者必須接受和瞭解的。當能指和所指之間並不是決然的對應關係時，我們就必須考慮到這個過程中各種分裂的可能；這個分裂的可能使得我們對空間的解釋不能被歸結為一。這裏我們必須要看到，如果我們所做出的符號學解釋不能被歸結為一的話，那麼符號的意義不僅是被削弱，也有可能是被取消。對於一個符號學者而言，這種無法確定意義的狀態是否是可以被接受的呢？在這裏我想要說明的是，如果我們認為生產只是一次性的話，我們就不得不承認符號的意義是被這種分裂的結構關係所削弱和否定了，我們自己也就取消了我們自己。可是，就是因為我們承認語言符號並不是一個唯一的衡量和建構標準，我們就始終能夠在表達中去看到能指和所指的分裂，而在觀念中找到轉換的可能。這種變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不能夠無限制地放開。符號可以無限地衍義，但它不是以同樣的速度、同樣的空間佔據方式去進行擴散。符號意義的分裂過程並非標準化的；在這種符號的衍義或者說意義生產過程中，重新去審視空間的結構和變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果像菲斯克所說的那樣，女性只是運用一個想像的空間來實現一種逃逸的可能和短暫的自我解放，這種自我愉悅式的個人空間建構是可以達成的；但它不具有太大的積極意義，也不能夠擴散到社會中的群體中去。這是一種消極的、不具有抵抗性的幻想空間，但它對經濟、文化、政治的生產和再生產都無法做出正式的抵抗和反制。在後

現代社會資本主義的、虛擬化的空間裏，個人確實可以製造出一個非現實的、網路化的空間；但如果是在現代或者前現代社會，它的積極抵抗意義何在呢？而這種虛擬化的網路空間和現實的社會生產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脫節的，至多就是在消費主義狀態下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消費和服務關係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影響，但它本身還是消極的。

彭：也許符號學家可以解決解構主義者把一切意義都消解掉了之後面對的問題：意義的重新建構。借助符號學，我們可能能夠建立一種有抵抗性的、積極的符號意義。

蔡：是的，我認為把什麼都解開是一個很好的過程，但它不可能永遠都呈現一個這樣的狀態。知識份子本身就有一種傾向，就是在一個混亂和無序的狀態中去找尋規律，去探尋知識上、哲學上的種種關係。這是我們要傳承知識所必須具有的一個前提和過程。當意義、組織、國家、所有的界限都打亂、都不存在的時候，就會回到德勒茲（Gilles **Louis-René** Deleuze）所說的狀態，每個人都成為單子化的存在。這樣一片社會的海洋是可以形塑出來的，但在這樣一片海洋中，你也沒有辦法進行高級的、知識的累積。我應該還是算是一個“食古不化”的傳統的符號學者，我始終認為：不管是什麼樣的破解，如果你沒有一個關係和意義的建構，就不可能進行知識的累積和傳承。就算把權力解構掉，它也不可能一直不存在，而是分化到了各個角落；所以無論怎樣的解構、抵抗和反省，最終都會回歸到某種規則，一定會規則化和定向化，然後你才有可能累積下一次的力量，進行下一次的反省和抵抗，而不是單純地、一次性地達到最終目的而再也沒有進化的可能。列斐伏爾的空間學派認為空間會再生產，而符號學者認為意義會不斷地產生，這也就映照了皮爾士（C.S. Peirce）所說的：在各種不同類型的符號表徵和它的意義物件之間，始終存在著解釋項（interpretant），這個解釋項維持著意義的不穩定狀態中的動態平衡。在我看來，這樣的一種動態平衡關係可以幫助我們在能指和所指、或者是符號和物件之間把意義確定下來，並且把單個的語義關係確定下來，使之在橫組合軸和縱聚合軸（the syntagmatic and paradigmatic）產生對應的關係和意義。解釋項這樣一個中間的位置確保了動態的平衡關係，或者說是不平衡之下再度平衡的可能。

彭：我們可以看到，您的研究主要是把空間理論和符號學理論融合在一起，對文學文本和文化進行了細緻的、具有原創性的批評。在確定這個研究方向之前，您對符號學的基本理論、特別是結構主義符號學都有過很系統的、深入的討論。在當今學界對結構主義“避之不及”的背景下，能否請您談談您對結構主義符號學的看法？它的意義何在？

蔡：我的研究是從結構主義開始的，所以從個人的角度而言，我始終對結構不能忘懷。就像我剛才所說的，不管你如何解構，始終還是要回到一個架構之中去尋求和延續它的一個不穩定的平衡。早期的結構主義者的看法比較單純，他們認為人類是用語言來傳承知識和建立權力結構關係跟規範的，所以語言是一個很好的評價世界的標準和工具。索緒爾學派提出的能指和所指之間的指涉關係，也是人為什麼能脫離動物行為、建立文明思維的一個重要指標。就這一點而言，結構主義者是正確的；只不過當研究開始進入到後結構主義時，我們就開始質疑：是不是只有語言符號才具有這樣的功能性？語言符號和它所指涉的現實之間的關係是不是如結構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限定性的？在結構主義的觀點下，語言和現實之間的分裂性或者說差異性只能盡量被減低，學者們只能去強調語言的共同性。這種語言的限制關係導致了結構主義符號學的式微，因為它強制地割除了、或者說故意地壓制了符旨和符征之間的可能變化關係。這種壓制的效果轉換到法規、文明或者說文化符號和知識體系的生產建構中時，爲了要建立符號意義的必然的對應關係，維持權力的穩定性和已經確立的邏輯關係，我們就必須壓制和排除雜音。這也就類似於語言對言語的壓制，任何奇怪的解釋、任何不符合整體系統的衍義必須劃分出來，並且對它加以整治。因此結構主義的符號關係也就被視爲類似於權力體制對異見者的壓制，結構主義符號學也成爲瞭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各種主

義所質疑、指責、交相攻擊的一個物件。

事實上，結構主義是具有它的歷史意義的；而不少結構主義者後來也轉變成爲了後結構主義者。結構和後結構其實並不是一刀兩斷的，就像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本身也無法切開一樣。在遇到外界的質疑和刺激之後，結構主義者開始看見他們之前無法看到的盲點：他必須要轉型，他必須要開放他自己。我在研究裏法台爾的核心語（hypogram）這一概念時就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地方：裏法台爾認爲文本意義的建構是從橫組合系統轉向縱聚合軸系統，他把這個過程比喻成爲一個“甜甜圈”，這個“甜甜圈”的關鍵點就是它中心的空洞。我們都知道，如果沒有空洞，甜甜圈就不成其爲甜甜圈，就只是一塊餅；而這個空洞就是核心語，是隱藏的一個符譜。正是由於這樣一個空洞的存在，才能在橫組合系統中把那些不符合章法的意義解釋成爲合乎章法的。這樣的比喻就讓我們看到語義是如何結構化的：它不是去割除那些不符合規範的雜音，而是提供了一個轉換的機構，可以濾掉雜音，顯現出它本來想要表達的意義。**但是我認爲，既然雜音和中心語之間的關係是一個空心的所在，那麼它必然是開放的，它並不保證意義進入核心語之後的轉換會讓讀者都得到唯一的答案。當我們把銅板丟入壓幣機，所壓制成的都是同樣的圖案，原來的銅板被施以了延展性的轉變；但核心語不是一台這樣的壓幣機，它中間是空心的，你輸入的意義並不一定按照你的意圖去走。核心語內部的結構是不能用結構主義符號學的框架去描述和解釋的，它既是一個重要的收編雜音的關鍵，也有可能在某些狀態下失去收編雜音的功能，而產生不符合規範的意義。它既可以将雜音濾除，回歸正統；也可能在轉換的過程中轉出一個“四不像”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能保證所有的個體都達到一個預設的標準。因此，核心語這個概念是我認爲裏法台爾的理論可以被翻轉向後結構主義的關鍵點所在：它既可以解釋結構，也可以解釋後結構。如果我們仔細地剖析裏法台爾的核心語概念所可能內藏的這種轉變契機，就會對結構主義者有更多的理解，而不是一味地認爲他們結構化的過程必然要割除雜音，壓制異議，並且而是能夠看到結構主義到後結構主義的連綿關係：結構主義是後結構主義所依賴的養分，也是後者發展的基礎和前提。**

彭：是的，這種理論之間的聯結關係其實是我們現在常常會忽略掉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您的這一研究似乎是對現今的青年學者們的一個提醒。學術界如今看重解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研究，因此許多青年學者們爲了更快地出成果，往往一窩蜂地集中到對新的各種學術思潮的討論上，而沒有看到：如果沒有對一個先在的理論的系統性的研究，對它的批評也不會是深刻的、站得住腳的。不論是後結構主義研究，還是**先(現?)**在正在成爲熱潮的符號學研究，都不能只是一個時髦的名詞和空洞的跟風，而是需要沉下心來，爲自己的研究先做一個基本的、扎實的學術積累和鋪墊。我現在想向您請教最後一個問題：您認爲符號學在中國或者說華語界應該如何發展，才能體現出自己的研究特色，而不只是對西方學界的模仿和跟隨？

蔡：對於這個問題，我的一點淺見是：作爲符號學者，我們的研究一定是從對西方符號學理論的學習開始的；這是一個不容否定和回避的事實。西方符號學者積累下來的學術資源爲我們奠定了理論基礎，這是我們的學術養成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根基。但是，如果我們將符號學看做是可以被不同文化、不同國族的學者們可以去學習和使用的一種理論方法，我們就不應該把它當做一套只能去傳承和奉行的機制。中國或者說華語世界所具有的文化根基、以及華語作爲一種語言本身所具有的特定的符號關係，包括中華民族的道統和現有的政治規範、道德系統和宗教信仰，都是和西方完全相異的，這就是我們需要著力的地方。符號學作爲一種工具，它本身就是用來研究觀看世界的方式、研究人的世界觀、文化觀和種種的文化政治生態；作爲和西方有著全然不同的文化養成方式和文明背景的華語界學者而言，我們要重新拿這樣的一套工具去研究我們自己各種可能的觀看世界的方式。我們應該從符號學的結構式的研究開始，去扎扎實實地做細部的研究工作，對我們豐厚的文化歷史基礎進行深入的研究，

並且將它發揚出來。

蔡秀枝，「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外國語文系暨研究所教授。tsaihc@ntu.edu.tw

彭佳，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pj8024@163.com